

# 习仲勋与陕甘边根据地

马 啸 温金童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内容摘要】作为陕甘边苏区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习仲勋为建设巩固的陕甘边根据地、迎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陕甘,呕心沥血,立下了不朽功勋。习仲勋对陕甘边苏区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危急关头主持陈家坡会议、出任南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著名的十大政策、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根据地的创建模式进行了新探索等诸方面。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陕甘边 习仲勋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8-0040-03

习仲勋是陕甘边苏区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即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交界的区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地域<sup>[1][P1]</sup>。陕甘边根据地从1932年寺村原根据地算起,至1935年与陕北根据地统一成西北根据地,前后坚持四年之久,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本文仅就习仲勋陕甘边工作的几个侧面,追忆习仲勋在陕甘边的光荣岁月,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 一、陈家坡会议挽危局

1933年初夏,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由三原移防到耀县。经陕西省委批准,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骑兵团1000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时,习仲勋的伤还没好,得知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迎接。王泰吉起义后,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张仲良、封正宝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习仲勋任副主席的照金苏区。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12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sup>[1][P31]</sup>。照金根据地立刻成为敌军围剿的区域主要目标,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陕甘边党和红军的生存。陈家坡会议就是在照金根据地存在严重危机的险恶形势下召开的。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秦午山、习

仲勋、高岗、张秀山、李妙斋、王泰吉、杨森、黄子祥、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王伯栋等<sup>[2][P266]</sup>。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尚未归来,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抱病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

在会议执行主席习仲勋的组织领导下,陈家坡会议重点讨论了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当时左倾思想有所抬头,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与会同志决心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会议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陈家坡会议之后,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部队迅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消灭驻让牛村的雷天一民团和驻庙湾的夏玉山民团,以及柳林民团;1933年9月25日又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消灭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迫使照金根据地周围的反动民团后撤。这些战斗胜利,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短时间内显现了陕甘边特委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具有的重要政治领导作用,鼓舞了陕甘边革命队伍的信心,屡经挫折的陕甘边革命形势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

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家坡会议,是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回归照

\* 作者简介:马啸(1966-),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区域史、根据地史;温金童(1968-),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陕甘宁边区史。

金根据地的情况下,坚持中共陕甘边特委坚强的核心领导作用,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结合陕甘边的实际,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所取得的成果,这对及时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对军事上重建红二十六军起到了关键作用,使陷入低潮的陕甘边革命形势获得转机的重要会议<sup>[2](P270)</sup>。所以,在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中,陈家坡会议具有关键性的重要历史作用。

## 二、主政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习仲勋等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春,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特委书记张秀山,习仲勋为革委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1934年11月,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因为习仲勋在照金根据地时期担任政府副主席,因此被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当时,习仲勋只有21岁,所以被称为“娃娃主席”<sup>[3]</sup>。

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等制定了土地、财经、军事、统战、社会工作等“十大政策”,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廉政建设。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把廉政当头等大事,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习仲勋回忆:“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sup>[4]</sup>。有了这条法令,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干部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土改工作。陕甘边根据地的土改工作是习仲勋等坚持群众路线的典型诠释。与南方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不同,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体现了明显的地域特色。鉴于“群众对于分土地并没有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面对这种情况,习仲勋代表边区领导做出了“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废除一切债务和高利贷,组织互助合作社”<sup>[2](P270)</sup>等合乎边区农村特点、顺应边区农民要求的具体规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三,经济建设。革命的目的,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南梁陕甘边区政府成立后,通过了财政、粮食等问题决议案,颁布了商业、会融、贸易等法令政策,刺激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了搞活农村经济,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也日渐活跃,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边区政府还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

系,在南梁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设立了造币厂,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苏票”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边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文化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陕甘边根据地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早在1932年,红26军就在香山寺游击区成立了随营学校,传授文化知识。1934年10月,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的军政干部学校开学,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中、下级干部,教学内容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为陕甘边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边区政府成立后,又在荔园堡、太白等乡村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开展成人文化教育<sup>[5](P934-935)</sup>。

第五,移风易俗。边区政府还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sup>[6]</sup>的法规,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的条例,努力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开展的各项建设,扩大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影响,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至此,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到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在“娃娃主席”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 三、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法宝。“左”倾冒险主义在陕甘边的代表杜衡,却否定统一战线,污蔑做统战工作的刘志丹等人是“投降主义”,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还曾火烧香山寺,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寺村塬、照金苏区的丧失。习仲勋等对此做了坚决的斗争,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统战工作,习仲勋有过客观评价:“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sup>[7](P165)</sup>

习仲勋多年在陕甘边根据地从事兵运工作,与杨虎城部建立了密切联系。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sup>[4]</sup>中共中央进驻陕甘以后,继续加强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习仲勋等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功不可没。

习仲勋等灵活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将视角转到其他根据地，就会发现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当时许多根据地都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张国焘在川陕边根据地时采取“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的俘虏政策，杀掉不少俘虏的营以上敌军官，刺激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给革命带来损失。真理常常是在比较中被认识和把握的，把习仲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实践与张国焘的做法做一横向比较，让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习仲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大胆创新。

#### 四、在实践中探索适合陕甘边实际的根据地创建模式

习仲勋领导陕甘边根据地武装斗争时期，坚持“灵活机动、不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的战略战术，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新模式，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也为后来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准备了根据地这个最基本的条件<sup>[8](P26)</sup>。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sup>[9](P60)</sup>。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更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据此，刘志丹、习仲勋等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据地建设的陕甘模式。习仲勋说：“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sup>[7](P287)</sup>事实证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陕北、关中、陇东三个游击区互相配合，红26军居中策应，倏忽不定，似狡兔三窟，造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各区地方游击队发展迅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红26军<sup>[6]</sup>，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

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创立根据地的陕甘模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发展。毛泽东赞扬说，“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一时在此一时在彼，是非常有用的，很高明。”抗战时期，毛泽东又将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sup>[10](P472)</sup>

陕甘边根据地是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主战场，在这片黄土地上，习仲勋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理想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不唯书、不唯上，自觉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陕甘边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探索根据地创建的新模式，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落脚点，同时发展成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参考文献：

- [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简述[M].1984年油印本.
- [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3] 马文瑞,张邦英.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N].人民日报,2003-10-14.
- [4]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N].人民日报,1993-10-24.
- [5] 刘凤阁,任愚公.红26军与陕甘边苏区[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 [6] 蔡子伟.南梁革命根据地斗争片段回忆[M].陕西文史资料,1980(9).
- [7] 习仲勋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
- [8] 党史通讯[J].1986(3).
- [9] 张秀山.我的85年——从西北到东北[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10] 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